

第九屆

宋代文學

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 沈松勤 馬強才 編

SONGDAI
WENXUE
GUOJI YANTAOHUI
LUNWENJI

 浙江大學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第九屆

宋代文學

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 沈松勤 馬強才 編

SONGDAI
WENXUE
GUOJI YANTAOHUI
LUNWENJI

 浙江大學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九届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 沈松勤, 马强才
编.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7. 8
ISBN 978-7-308-17285-1

I. ①第… II. ①沈…②马…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
文学研究—宋代—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I20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98761 号

第九届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沈松勤 马强才 编

责任编辑 宋旭华

责任校对 胡 畔

封面设计 周 灵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34.75

字 数 623 千

版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7285-1

定 价 1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sbs.tmall.com>

目 录

日本苏轼研究新著序文两篇·····	王水照(1)
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藏正中元年(1324)跋刊本《诗人玉屑》考论 ——兼论《诗人玉屑》在日本的流传·····	卞东波(8)
南北嗜好知谁贤 ——中唐至宋代诗歌中的南食书写与士人心态研究·····	曹逸梅(28)
“江湖诗派”概念的梳理与南宋中后期诗坛图景·····	侯体健(43)
论南宋诗歌的市井审美·····	李黎(64)
北宋末年的五首题《中兴颂》诗·····	莫砺锋(79)
试论《石门文字禅》中景画诗禅之交融·····	周裕锴(100)
宋词长调“金曲”《满江红》词调探源·····	刘尊明(122)
苏轼词《西江月》(点点楼头细雨)编年考证·····	罗燕萍(136)
宋代无名氏词刍议·····	谭新红(147)
范仲淹边塞词的现场勘查与深度阅读·····	王兆鹏 肖鹏(162)
北宋前期词作中转调与犯调现象研究·····	姚逸超(178)
从乐府学范畴看词的叙事性·····	张仲谋(193)
宋代科举策文的话语分析·····	方笑一(209)
楼钥《北行目录》的文体、空间与记忆·····	李贵(220)
重编《说郛》所收宋元诗话辨伪·····	罗宁(236)
审美·博物·追忆 ——《洛阳牡丹记》中的私人情境·····	沈扬(261)
宋杂剧金院本“耍秀才”剧目考·····	杨挺(277)
苏轼与滕达道尺牍考辨·····	朱刚(298)
论南宋的“词科习气”及其批评·····	管琴(309)

宋季元初科举存废的文学史意义

——以诗歌为中心之考察…………… 林 岩(326)

庄园与南宋中后期文人群体、诗词趣向 …………… 刘婷婷(360)

修辞技艺·信息传递·知识扩散:诗歌自注的多重功能

——以王安石、苏轼、黄庭坚为例…………… 马强才(370)

南宋中期自撰诗集的生前刊行

——宋代士大夫诗人的诗人意识及其性质的演变…… 内山精也(385)

宋代制举与士人行卷…………… 钱建状(403)

“避言”与“度词”

——论言论统制下苏轼的文学文本…………… 浅见洋二(417)

论佛禅诗对宋代理学诗的影响…………… 王利民(448)

江湖诗人的公共“文坛”

——以月泉吟社为中心…………… 熊海英(472)

武林艺事

——苏轼《天际乌云帖》及其“奇趣”观…………… 衣若芬(486)

《宋登科记考》补正…………… 诸葛忆兵(504)

附录一:第九届宋代文学学会国际会论文集总目录 …………… (544)

附录二:中国宋代文学学会理事会名单 …………… (549)

编后记…………… (550)

日本苏轼研究新著序文两篇

复旦大学 王水照

《苏轼文学的继承与苏氏一族》序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苏轼病逝于常州,对他的政治历程而言,未始不是幸事。此年十一月,徽宗即诏改明年年号为崇宁元年,标志着重新推行熙宁之政,打击包括苏轼在内的元祐党人,政局又将丕变。果然,次年五月,苏轼还未安葬,即被贬为崇信军节度行军司马,但这第四次贬官已是他身后之事了。苏轼的早一年去世,使他免去了又一次贬逐之哀与流离之苦,岂非幸事?然而,对于北宋文坛和苏氏家族而言,却确实进入一个艰难的“后苏东坡时代”。文坛失去盟主,家族失去灵魂,士人们普遍从失落而焦虑而困惑,力求有所振兴;族人们多方努力,谋求延续苏氏文脉,以维护苏学于不坠,于是演绎出种种眩人眼目、耐人深思的历史故事和文学故事,成为宋代文学与家族关系研究的一个新课题。这个课题充满魅力与富蕴价值,不但可为目前方兴未艾的“跨学科专题研究”的热潮提供新的实例,也必然会丰富研究思维、视角和方法。

本书作者原田爱君敏锐地抓住这个好课题,深入开掘,用心拓展,获得了可喜的成绩。面对并不丰厚的前期研究成果和尚待爬梳、整理的零散文献资料,她选择重点突破、以点带面的研究策略,避免概述式的面面俱到的简单罗列,以“和陶诗”为中心就是她的第一个切入点。

苏轼的“和陶诗”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特殊现象。诗人之间互相唱和原是中国文人日常的交游活动,但是,要把前辈作者的全部诗歌尽和殆遍,在苏轼之前是绝无仅有的。如果仅仅着眼于诗歌艺术而言,唱和诗必然面对两个难题:一是和作应与原唱保持思想内容上的应对衔接、交流碰撞,以及诗风上的风味相类。然而,和作之于原唱,学不像固然不能称好,学得可以乱真也未必好,实处于创作前提上的两难选择;二是韵律的拘限,如是“步韵”、“次韵”更有严格的押韵要求,真是“戴着镣铐跳舞”了。深知诗歌真谛

的苏轼自然懂得此理,却自觉选择对陶诗“要当尽和其诗乃已耳”。他说过:“古之诗人,有拟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则始于东坡。”其创作冲动来自“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如其为人,实有感焉”,他自觉地要以陶为师:“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苏辙《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这说明他和陶渊明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精神认同和相似的审美趣尚,即自然任真的理想人格和人生智慧层面的深度对话,和他晚年对平淡诗风的倾心追求。这是我们对苏轼和陶诗意义的一般认识。

我想提醒读者的是,本书作者对于和陶诗现象的解读,并不限于从诗歌领域立论,而是联系宋代“党禁”清洗的大背景,密切结合北宋文坛和苏氏家族在“后苏东坡时代”的遭际,进行了别具识见的阐释。作者以苏轼生前、死后为界,细致地勾画出苏轼生前如何用心良苦地把自己的和陶诗分送给他的门人、亲族、友朋,这样的和陶诗达到九十九首(总数为一百二十四首),仅苏辙一人就收到乃兄六十五首。苏轼自觉地扩大他的和陶诗的影响,渴望引起亲友们的反馈,也果然形成了众声继和的小热潮。本书中都有实证性的一一论列。苏轼还具体要求苏辙把他的和陶诗编纂成集,“以遗后之君子”,视作要传诸后世的名山事业,显然也不仅仅把它看成一次单纯的文学活动。

我们检验和陶诗的内容,一般均是他当时贬谪中的日常情事,看似平淡无奇,不兴波澜,而其内蕴则涉两类主题:一是仕隐或曰出处,一是生死或曰对生命的终极关怀。苏轼和陶诗是从元祐七年(1092)扬州时开始的,虽已关乎仕隐问题,但未形成专门性的创作主题,至绍圣元年(1094)贬至惠州,他才决心“要当尽和其诗乃已耳”,并普遍寄赠,“约诸君同赋”,造成舆论热点。这一系列活动表明:他的和陶诗写作,已从个人一己的抒发扩展到尽可能广泛的群体,体现了他作为文坛盟主的作派和影响力;也说明此非一般性的诗歌唱和,而是元祐党人在横遭折磨打击的困难时期借以相互慰藉和心灵交流,发抒这一特定政治群体在“大清洗”中的心声的重要方式,应看作“苏门”一次特殊的文学活动,而苏轼依然发挥着引领和核心的作用。自然,“苏门”对此事的反应并非铁板一块,黄庭坚就是“苏门四学士”中唯一不写和陶诗的人。虽然他曾高度评价苏轼之作,“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彭泽千载人,东坡百世士。出处虽不同,风味乃相似”(《跋子瞻和陶诗》),但当苏辙致函亲邀他参与唱和时,他却未应命。内中情由,颇堪玩索。

苏轼死后,文坛和苏氏家族的领袖人物一时发生中断,其实有一位现成的人选,那就是苏辙。苏过《叔父生日四首》其一云:“斯文有盟主,坐制狂澜漂”,“手持文章柄,烂若北斗标”,“造物真有意,俾公以后凋”,就是这种愿望

的表达。苏辙时居颍昌,处于政治的低谷期,但他仍在推动“许党”新生门人继写和陶诗活动中作了巨大努力。本书作者对此提供了较为丰富的资料和引人入胜的描述,不少还是第一次见于引用,多少展现出苏辙领袖群彦的盟主风采。但他毕竟与乃兄年岁相间的密度太小,还不足以形成代代相沿的序列(当时士人中也有推举“岿然独存”的张耒为苏轼继承人选,不过反映文坛的一种焦虑而已),加之处于政治上的低谷期,其个人的文学成就、人际关系的亲和度尚不足与苏轼匹配,因而北宋文坛盟主只能历史地终结于东坡。本来,某个文坛的形成和盟主的出现,是多种政治社会条件和盟主个人综合素质交互作用的结果,而不是人为刻意制造的。

“一门父子三词客,千古文章四大家”,作为文化家族,苏氏一族在“贵经术而重氏族”的眉山地区首屈一指,蜚声海内外,其地位和影响远胜于同时的澶州晁氏、临川王氏、南丰曾氏等。苏洵十分重视氏族的建设,他撰作的《苏氏族谱》与欧阳修的《欧阳氏族谱》,发凡起例,开创了宋代族谱编纂的先河。苏轼的家族观念也根深蒂固,在他诗文中多有表露。在海南所作《和陶郭主簿二首》中,记叙他偶听幼子苏过朗读诗书,“诵诗如鼓琴”,就联想到自己四十年前,因吟诵诗书而得到父辈的称赞,不由得使他“追怀先君宫师之遗意”,入夜还梦见两位孙子。这个“遗意”就是“家世事酌古,百史手自斟”的苦读精研的旨趣。从一个偶然性的日常经历,能联想到与父、子、孙、四代人的关联,充分说明家族文脉的传承和延续,始终是苏轼念兹在兹的情结。在苏轼死后,苏辙在颍昌聚集苏氏家族近二百余口,传为一时盛事。他亲自教育子、孙两代,现存苏籀所辑《栾城先生遗言》即可见谆谆教诲的情景,他并叮嘱“传诸笔墨以示子孙”。他为“诸子才不恶”(《示诸子》)而感到自慰,又以“少年真力学,玄月闭书帷”(《示诸孙》)相励,都表现出力求文化世家绵延不衰的自觉性。

比起晁氏、王氏、曾氏等家族来,眉山苏轼一族有几点特征更较突出。一是子嗣繁衍,家族成员众多。苏轼、苏辙各有三子,苏轼有十三孙,苏辙有九孙,两人的曾孙、玄孙辈已不能详知,可谓绵绵瓜瓞,人丁兴旺,属于绵延长久型的家族。“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而苏氏却是少见的例外,便于从历时性上考察家族的发展和演化。二是地域的展延性较广。二苏后人分布大江南北,主要有许昌、眉山、宜兴、婺州四支。眉山乃其发祥地,许昌和宜兴分别是二苏终焉之地,均留有子脉。苏迟迁官婺州,开创浙东一支,也颇令世人瞩目。区域扩展和联动,有可能发展出更为广泛的人际网络关系,增加文人交游的频率和深度,也使整个家族具有面向全社会的开放性。三是家族成员多具文化修养和文学才能。二苏后代在当时士人心中均留下能够

继承家风的良好印象,“况其子孙,且有典型”,“尚有后昆,克绍其门”,“学有家法”之类的评语,随处可见。虽然他们之中很少大家、名家,但都保持相当的水平。其中如苏过,有“小东坡”之称,其《斜川集》亦有不俗的成就。

钱穆先生有言:“家族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最主要的柱石。”苏氏家族应是极具研究内涵的个案。深入探讨其社会功能和文化功能,尤其着重其文人交游网络中所蕴含的信息,对促进文学生产的互动和激励,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方面。即使是家族内部的文化教育和文学训练,乃至文献图书的整理和积累等,也有开发的空间。事实上,近年来也获得了一些成果;限于材料的分散,这些成果只能说是初步的。原田爱君的这部著作也不是全面的系统性著作,她仍然采取以重点专题切入的方法,从一个侧面来揭示苏氏家族与文学关系的面貌,即二苏文集的系统整理、刊刻、传布的研究,成为本书的第二个切入点。

本书作者花费巨大精力,钩沉阐幽,细致地推原出二苏后人对先人文集编印的全过程。苏轼文集在他生前已初步编纂,但遭遇党祸,毁版禁行。后人们抓住政局转变的有利时机,适应高宗、孝宗对苏轼文学的爱赏,及时重新编印。其中苏过的编纂和讲释,两位曾孙苏峤、苏颀的刻印,均产生重大的作用和影响。从本书描述中,我们看到苏轼的文集如何从苏轼本人开始,延及苏过、苏峤、苏颀等几代人不懈的努力,才获得颇为完善的面貌,强烈地表达了对家族文化资源的坚守与坚持。书中还讨论到苏峤编印《东坡别集》,前此还少有学者论及。苏颀参与刻印《许昌唱和集》,内收他祖辈苏过、苏迨的作品,论叙也颇为详尽。苏颀为曾祖苏辙编印《栾城集》,也功不可没。这都体现了家族的凝聚力和自豪感,以及恐坠家声的忧患意识,而对传播苏氏文化而言,却是功在千秋的大事,直到今天,我们仍在享用他们的劳绩。

原田爱君此书内容丰富,涵意深长,我仅就两个“切入点”说开去,借以表述我对文坛盟主、家族文化问题的一些想法,不当之处难免,敬请读者教正。同时期望本书作者以此为良好开端,继续精进,贡献出更好的成果。

二〇一四年十月于上海复旦大学

《苏轼诗研究——宋代士大夫诗人的结构》序

内山精也教授是一位诚笃踏实而富有创造力的中青年学者,多年来又与中国学人密切交流,倾力相助,获得同道们的衷心称道。他的新著《苏轼

诗研究——宋代士大夫诗人的结构》，是他长期从事中国宋代文学研究的结晶，以其富于探索精神的史观、自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和丰赡厚重的史料，成为他治学道路上的一块界碑，必将引起中日研究界——特别是宋代文学研究界的关注与重视。

收入本书的文章，当其以论文形式初载于各刊物时，我大都已拜读过，现编为四个部分：（一）作为士大夫的苏轼；（二）东坡乌台诗案考；（三）苏轼诗的技巧；（四）苏轼的周围。就显得层次井然，布居适当，把我分别阅读时见到的一山一水、一村一落，联缀成一个逻辑严密、略见体系的完整图像。究其原因，实在于作者心目中已有一个整体把握在，其关键词即是“士大夫”，这是对宋代文学创作主体的社会身份的重要认定，具有深远的意义。中国二千多年的传统社会性质，通常判定为“封建社会”，近年来备受诟病，从而提出“君权专制社会”、“帝制农民社会”、“宗法地主专制社会”等多种提法，自是学术探讨的正常现象。若从科举制度着眼，宋以后以进士及第者为中心的“士大夫”阶层的形成，取代六朝以降的门阀士族，从而成为政治、法律、经济决策和文化创作的主体，制约并影响着中国传统社会的形态与发展。在这个意义上，若说宋以后的中国进入了成熟的“科举社会”，似无不可。本书书名为“苏轼诗研究”，副题却是“宋代士大夫诗人的结构”，已经提示出作者不是单就苏诗论苏诗，而是着力于从宋代士大夫诗人的知识结构这个新视角来切入；也显示出作者从事宋代文学研究，有个一以贯之的理念，有他潜心求索后而形成的“史观”。这种学术探索精神是每位研究者应该具备的。

作者认为，北宋中后期出现了一批官僚、学者和诗人“三位一体的知识人”，恰与进士科的三项考试项目相对应：“帖经”“墨义”“经义”（学者型）、“策论”（官僚型）、诗赋（诗人型），这就不是偶然的。三者结合正是宋代士大夫的理想范型。作者又进一步分析，此三项从横向比较而言，并非不分主次，而是偏重策论（官僚型）；从纵向发展而言，三者存在此消彼长的变化，直至宋代后期逐渐形成一批科举体制外的士人，即江湖诗人群，逐渐与士大夫诗人原来的理想范型相疏离，而具有另一种新的历史意义。

本书以苏轼为主要论题，但作者不拘执于题下，就事论事，而是在“士大夫”、“士大夫社会”等理念的引导下，以前后打通的宏阔视野进行考察、探讨，不仅创获甚巨，启人心智，同时也展示出新的学术空间，预示着研究前行的方向。事实上，作者也已着手进行江湖诗人群的全面研究，值得我们期待。

内山教授不仅善于提出一些贯穿全局性的理念与观点，努力使宋代文

学研究导向有思想的知识系统,而且在一系列具体问题也新见迭出。用宋人的话来说,既在“大判断”上表现出有探索性的史观,又在“小结裹”上体现出具有深度的史识,并努力于两者的结合,这是本书的又一特点。浏览内山教授的论文选题,一类是旧题新作,如论王安石《明妃曲》、苏轼“庐山真面目”、苏轼次韵诗词等,均能在前贤研究基础上,适度吸纳接受美学、传播学等理论成果,探究宋代士大夫的心态和审美趋向,虽旧题却仍能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一类是选取新题,另辟蹊径,如论印刷术与宋代文学关系,在十多年前,尚少有学者论及,内山教授敏锐地予以开发、探讨,尤用力于揭示两者内在的互动作用,又与宋代社会转型问题相联系,开拓了学术视野。要之,从具体论题入手,提炼出理论性命题,深入于实证经验性材料,涵咏搜讨,勤于思辨,从中引出其固有的意义与结论,实是学术研究的基本方式与方法。内山教授的每篇论文,均能达到有新意、有内容、不蹈袭、无空言,端赖自具史识所致,难能可贵。

重视史料的搜集与运用,这是日本汉学的突出优点,实其“强项”所在,素为中国学人所钦佩。内山教授受过严格而系统的学术训练,在本书中把这个优点发挥到相当精深的程度。谨以“东坡乌台诗案”为例。“乌台诗案”是中国文祸史上的著名事件,审判对象竟是一代文豪苏轼,案件涉及上自皇帝、太后、元老重臣、硕士俊彦,下至狱卒、捕快等办案胥吏,纠结于新旧党争和朝野舆论,尤其是留存至今的完整的审案原始档案《东坡乌台诗案》一书,更是史无前例的珍贵资料。这自然引起研究者的兴趣,已有如清人张鉴《眉山诗案广证》之类的著作,今人更多各类论述,似乎难以为继。内山教授却迎难而上,因难见功力,在本书中用较长的篇幅重勘此案,他梳理了案发、审判、结案的全过程,几乎达到逐日记事、每事必考,剖析毫芒,决不懈怠,又追踪作为机密档案《东坡乌台诗案》的外传途径及其条件,还深入考索此案与社会、政治乃至诗歌观念、印刷媒体等的关涉,就我的闻见而言,是迄今为止描述最详尽、梳理最可信、论述最深刻的成果。这首先得力或者得益于在史料上下了大功夫。他从穷尽式的搜集史料开始,再进行科学排比、细心梳理,并对各条史料的可信度一一做出鉴别,然后才下断语。这一方法,真正做到材料为我所用,而不是成为材料的奴隶,使整部著作显得资料丰富而不芜杂,整理细致而不琐碎,避免了常见的堆垛罗列之病。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是日本汉学研究的重要分支,经过一代又一代日本学者的辛勤耕耘,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绩,并形成了优良的传统。我在五年前编辑的《日本宋学研究六人集》(第一辑),旨在向中国读者介绍出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日本年轻学者的成果,内山教授的《传媒与真相》即是其

中的一种。我当时就强烈感受到,这批活跃于当今东瀛学术界和教育界的新锐,他们既继承自己前辈师长们严谨精细的治学风格,而又面对复杂多变的时代风云和学术潮流,吸纳新知,融会西学,表现出自己的学术新追求,向后世传达出这一代学人的新思考和新祈向。同时也感受到,他们的论著与中国当下学者著作,比之上一辈来,有着更多的对话与碰撞,沟通与融贯,呈现出“和而不同”、交轂互动的良好势头。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内山教授是一位有自觉学术担当的学人,已近“知天命”之年,学识已趋成熟,任重道远,实有厚望寄焉。

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藏正中元年(1324)

跋刊本《诗人玉屑》考论

——兼论《诗人玉屑》在日本的流传

南京大学 卞东波

一、引言

一个时代学术的进步端赖新问题的提出与新材料的运用,在宋代文学研究愈加繁荣的今天,如何运用新的材料开拓新的问题,无疑是每一个研究者都必须面对的困境与挑战。近年来兴起的“域外汉籍与中国古代文学的综合研究”必将为未来的古代文学研究拓展新的领域并提供新的思路。域外汉籍研究不但可以为古代文学研究提供新鲜的材料,而且其提出的将中国古代文学纳入到东亚汉文化圈加以审视的方法更值得重视。本文欲以南宋时期著名的诗话集《诗人玉屑》为例来说明,从东亚汉文化圈的视野研究宋代文学的重要性。

魏庆之所编的《诗人玉屑》(下简称《玉屑》)是南宋最后一部诗话总集,虽然魏庆之是纯粹汇编宋代的诗学文献到此书中,没有发表个人的意见,但此书从理论框架、诗史建构,到作家作品、诗歌技巧的评论无不渗透着魏庆之本人的诗学思想,所以必须将此书纳入到南宋诗学史的脉络中,仔细地体会其中隐含的诗学体系才能明白此书的价值。《玉屑》不但建构了自己的诗学体系,而且提供了一套具体可行的诗歌创作指南,故其出版后,受到中国士子的欢迎,并很快就东传到日本,对日本汉诗学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时在日本被多次翻刻。

最意味的是,《玉屑》在东亚的流传是所谓东亚“书籍环流”的又一个典型案例^①。《玉屑》在晚宋刊印后不久就流传到日本,日本很快就有了五

^① 参见张伯伟师《书籍环流与东亚诗学——以〈清脾录〉为例》,载《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

山版,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正中元年(1324)玄惠跋刊本。正中本又流传到朝鲜,明正统年间朝鲜又以此为底本刻成了朝鲜本,后来朝鲜本又重新回传到日本,日本宽永十六年(1639)又以朝鲜本为底本翻刻成宽永本。20世纪初,王国维先生流寓日本期间读到宽永本,发现了不同于中国二十卷传本的域外刊本系统,遂以宽永本为校本对《玉屑》进行重新校勘和增补,后其哲嗣王仲闻先生对王国维校本加以点校出版,这个点校本遂成为我们今天阅读《玉屑》的通行本。因为当时条件所限,王国维、王仲闻先生俱未见到《玉屑》最早的二十一卷本正中元年跋刊本,故在此书校勘上还有进一步推进的空间。随着域外汉籍研究的进步,汇集中日韩三国《玉屑》的不同版本,对《玉屑》重新进行校订的工作应该提上学术日程。在《玉屑》众多版本中,正中元年跋刊本是连接宋本和朝鲜本、宽永本的重要版本,故厘清正中本非常重要,而且学界还未有人对此本进行专门的研究。正中本在日本也非常罕见,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贵重书库保存了一部完整的正中本,笔者有幸校读过此书,今将正中本的版本特色、与诸本的异同,以及《玉屑》在日本的流传稍加考述。

二、正中本《诗人玉屑》与诸本之比较

据黄升《诗人玉屑序》末所署的时间“淳祐甲辰”,可知《玉屑》至迟在淳佑四年(1244)已经成书^①。《玉屑》可能先由魏庆之初撰而成,后其子魏天应又对其进行了部分加工和增补,卷十七“秋菊落英”条末出现的“梅墅续评”就是当时整理留下的痕迹。

关于《玉屑》的版本,张健、唐玲、住吉朋彦三位学者都进行了研究,尤以日本庆应义塾大学附属斯道文库住吉朋彦先生的研究最为详实可靠^②。住吉朋彦先生在其《〈诗人玉屑〉版本考》中,将《玉屑》分为“宋末元初”本(下简称宋本)及“元本”系统,他认为正中本属于宋本系统。宋本目前存世仅有两本,一本现藏于台北“国家图书馆”,凡二十卷10册,原系晚清张钧衡旧藏。张钧衡(1872—1927),字石铭,号适园主人,吴兴(今湖州)南浔人,晚清民国时著名的藏书家,其藏有百余种宋元善本。此书有日本室町末期到江户初

① 关于《诗人玉屑》成书及魏庆之的生平考证,参见张健《魏庆之及〈诗人玉屑〉考》,载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编《人文中国学报》第10辑,2004年;以及刘德重、魏宏远《魏庆之传笺证》,载程章灿先生编《宋才子传笺证》,辽海书社2011年版。

② 参见张健:《魏庆之及〈诗人玉屑〉考》;唐玲:《〈诗人玉屑〉版本考》,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34辑,2012年;住吉朋彦:《〈诗人玉屑〉版本考》,载《斯道文库论集》第45辑,2012年。

期的假名训点,可能是晚清时从日本传入中国的。张氏藏书中一部分善本,见藏于台北,宋本《诗人玉屑》即为其中之一。笔者有幸见到此本,此本并非完整的版本,卷六、卷十三、卷二十等有缺页,并有晚清民国时人的钞补。另一本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目前仅存卷四至卷七,为晚清民国藏书家李盛铎(1859—1934)旧藏。元刻本现藏于北大图书馆,亦为李盛铎旧藏,但仅存17卷,现已影印收入《中华再造善本·金元编》。

据川濑一马先生研究,日本的《玉屑》五山版有两种,一种是日本南北朝时期所刊的无刊记本,亦为二十卷,完全是宋本的翻刻本;另一种就是正中元年玄惠的跋刊本^①。关于无刊记本与正中本的关系,住吉朋彦先生认为,日本南北朝无刊记本是正中本的底本,正中本又据“别本”加以增补了卷二十一^②。据川濑一马先生所见,五山版在日本共有四处收藏: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东洋文库(南禅寺正因庵旧藏)、三井文库、那波利贞氏藏本,其中京大藏本质量最高,是初印本^③。笔者有幸见到了京大所藏的正中本,共有十册,每册基本二卷,封面为薄黄纸,第一册表纸上书“共十册 明王院”,“诗人玉屑 一之二”字样。在卷二、卷四等卷之末,有墨笔书写的“施入圣光禅寺 祖西”字样,川濑一马先生认为是室町时代所书,全书并有室町时代所施的训点^④。

正中本四周双边,每半叶十一行,行二十一字,行款与台北所藏宋本完全一致,末有跋语云:

本云:兹书一部,批点句读毕,胸臆之决,错谬多焉。后学之君子,望正之耳。

正中改元 臈月下 澣 洗心子玄惠志。

释玄惠(1302—1350),号健叟、洗心子,通称玄惠法印,轩号曰独清。先为儒家,后归天台宗,为五山著名禅僧虎关师炼(1278—1346)之师弟。尝于清凉殿与禅僧通翁镜圆、宗峰妙超论辩禅宗宗论而失败,后皈依妙超。而后还俗,然无发而终身。玄惠详于宋学之新注,曾为后醍醐天皇讲解过《论语》

① 川濑一马:《五山版的研究》,第47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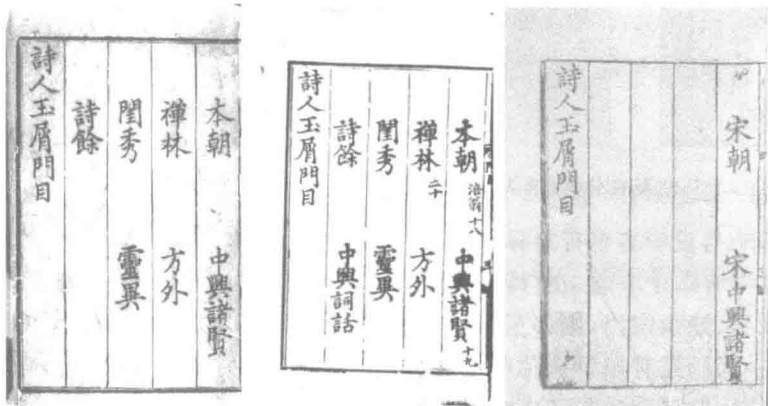
② 住吉朋彦:《〈诗人玉屑〉版本考》,《斯道文库论集》第45辑,第162页。住吉先生又以卷二十为例,比较了无刊记本与正中本的不同,详参上揭文。

③ 川濑一马:《五山版的研究》,第473页。

④ 川濑一马:《五山版的研究》,第473页。关于京大藏正中本详细的书志情况,参见住吉朋彦《〈诗人玉屑〉版本考》。

等书,他是较早将朱子学引进到日本的关键人物,以博识闻于世。备受朝廷与幕府之信任,并参与幕府建武式目的制定。著有《庭训往来》、《吃茶往来》、《游学往来》等书,曾注《圣德太子御宪法》,据说还是《太平记》的编者之一。林鹅峰(1618—1680)所编的《本朝一人一首》卷七收其汉诗《山家春兴》一首^①。

正中本源自宋本非常明显,而与元本多有差异。下图是宋本、元本、正中本“诗人玉屑门目”的结束部分,其差异可以比较直观地看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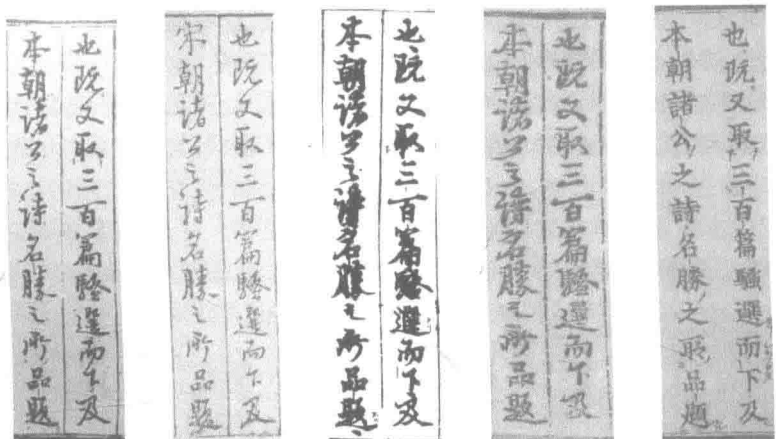
左图为台北“国家图书馆”藏宋本,中图为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藏正中元年跋刊本,右图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元本

从上可以看到,正中本和宋本从字体形式到文本内容都几乎一致,正中本可能是影刻宋本而成的,特别是两者皆称宋朝为“本朝”,完全符合编者魏庆之的宋朝人身份。同样的例子,亦见于“门目”卷三“句法”门,其正文分为“句法”、“唐人句法”、“本朝句法”三个子类,后者元本作“宋朝句法”。又黄升序中“下及本朝诸公之诗”之句,宋本、正中本、朝鲜本、宽永本全部作“本朝”,而元本则称为“宋朝”,改字非常明显^②。元本的“门目”到“宋中兴诸贤”后就戛然而止,脱漏了“禅林”、“方外”、“闺秀”、“灵异”、“诗余”、“中兴词话”诸门^③,正文也仅有十七卷,其下已全部散佚。

① 关于玄惠生平,略见林鹅峰编《本朝一人一首》卷七林鹅峰所作小传,载《词华集日本汉诗》第1册,东京:汲古书院1983年版,第62页。

② 王仲闻先生《诗人玉屑校勘记》亦云:“黄升为宋人,自应称宋朝为本朝。”《诗人玉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487页。元本一度被误认为是宋本,陶湘编《涉园所见宋版书影》时有小注云:“或疑‘宋朝’不称‘皇朝’,为元刻。”他的观察非常准确的。

③ 张健先生《魏庆之及〈诗人玉屑〉考》认为北大藏元本就只有十七卷,一是卷十七卷末有“全终”字样,二是目录中没有上列六门。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可从,那么正中本与元本的差异就更明显了。



从左至右分为《诗人玉屑》宋本、元本、正中本、朝鲜本、宽永本

宋本与正中本也有差异，即宋本仅有二十卷，“门目”到“诗余”就结束，而正中本有二十一卷，在“诗余”之后又多出一门“中兴词话”。宋本卷二十中的灵异、诗余两门，则移至正中本的卷二十一。何以正中本会多出“中兴词话”一门？这有以下几种可能性：1. 如住吉朋彦先生推测的，正中本在日本刻印时，鉴于黄升和魏庆之的关系，翻刻者另据“别本”，将黄升的《中兴词话》附于书后^①。2. 正中本并非袭自二十卷的宋本系统，而是源自某种现在已经失传的二十一卷的宋本。二十卷本可能是《玉屑》的初刻本，出版后魏庆之后人对初刻本又加以增订，增加了黄升的《中兴词话》，作为最后一部分“诗余”的补充。正中本“中兴词话”标题下两行夹注：“并系玉林黄升叔暘《中兴词话》，补遗。”这段话不像是日本翻刻者加上去的，而可能就是原本所有。如果能证明后一种可能性，那么正本中保存了已经失传的二十一卷宋本《玉屑》的面貌，其价值就更大了。

中国学者中董康比较早地注意到了正中本《诗人玉屑》，其《书舶庸谭》云：

《诗人玉屑》二十二卷。五山覆元本，每半叶十一行，行二十一

^① 张健先生《魏庆之及〈诗人玉屑〉考》也认为《中兴词话》部分是“后人增补进去的”。但这个“后人”是宋人，还是刊刻正中本的日本人，他并没有说明。张健先生又根据方回《诗人玉屑考》记载认为，宋末已刊行的《玉屑》就只有二十卷，并且元大德十年（方回卒年，1306）之前没有二十一卷本。按：如果二十一卷本为元时所增补，应该如现存元本一样，改“本朝”为“宋朝”。但二十一卷系统的正中本并没有改动，可能还是袭自某种为方回所未见的二十一卷的宋本。